

绝命诗呢？”

我们后来发现,有关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其他书籍中有些臆造和不实的材料已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以致只要在网上搜索有关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条目,就有编造和虚构的内容。经过我和思进的反复核实修改,希望本书中有关钱三强与何泽慧的文章能起到一定的以正视听的作用,为实现钱三强先生生前的冀望“还我原来面貌”做些微薄的贡献。

### 正直淳厚的戴芳澜教授和《中国真菌总汇》

戴伯伯一家在 50~70 年代曾居住 14 楼西端一层。

戴伯伯是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真菌是一类数目庞大的细胞生物,已被研究过且有文献可查的至少有 5 100 属、大于 45 000 种,世界上已有记载的真菌有 12 万种,戴芳澜教授估计在中国约有 4 万余种。而且每一种真菌的个体数量又非常巨大,由于它们具有多型性,繁殖速度快,产孢数量又大,它们的个体数量常常是几何级数增加,以致到无法计算的程度。戴伯伯晚年的巨著《中国真菌总汇》,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它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当年戴伯伯写这本书,是从 20 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1958 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



○ 戴芳澜于中关村 14 楼前

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写下了摘抄和分析心得。现在中科院档案馆保管的有限的手稿中,最完整的一份,就是戴伯伯的一套卡片摘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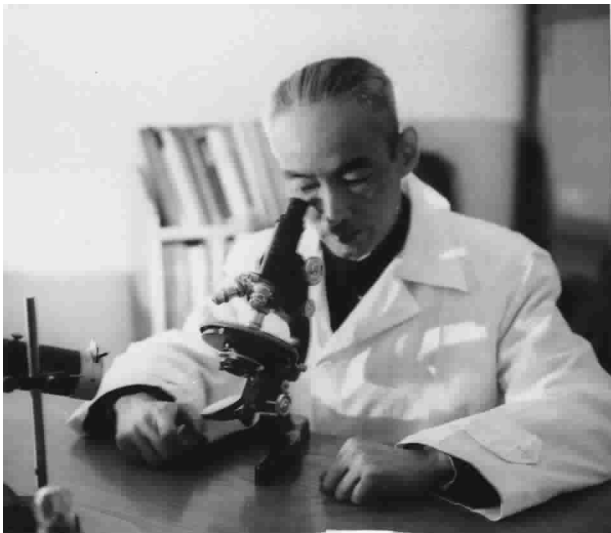
“文革”期间，戴家也搬进了几户人家，他们自己只剩下了一大一小两间房，两大橱柜的卡片摘抄无处可放了，戴老忍痛不得不让人搬到微生物所，后来微生物所捐给了中科院档案馆。在这些卡片摘抄中，不仅有戴老密密麻麻摘录的各类文献资料，还包括戴老精心描绘的各种真菌图谱，凸显出我国老一代科学家那种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看到这些摘抄，真让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汗颜，甚至连档案管理人员亦深为感动。

《中国真菌总汇》共参考了 768 篇文献资料，最早一篇发表于 1775 年，所引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语语种。200 年来，寄主的学名、真菌的学名、我国行政区域都有不少变动，都需一一进行核对、订正。为了便于我国科学工作者查阅，编著者还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缩写、颜色译名对照表等。

戴芳澜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仍然不顾年老多病，抱病工作，制定了《中国真菌总汇》的编写计划，写好了该书的前言，而把一些具体工作留给他的学生和年轻人去完成。他充分认识到这本巨著的历史价值，在《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写道：“虽然这本书在现阶段对我国真菌分类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它是具有时间性的。随着真菌分类学的不断发展，必须跟着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来不断地增订这本《总汇》。”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他自己与该书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他老人家对后来学子的期望和要求。他还在前言中写道：“我谨以此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短短一句话，既表露了他对即将完稿的自慰，又蕴含着他对自己奉献一生的依恋深情。

这本巨著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而是由他的学生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扫尾完卷，于 1979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1 258 页)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学报》21 卷 2 期(1980 年 9 月)上发表了悼念戴芳澜教授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72 卷 3 期(1980 年 5 月)也介绍了《中国真菌总汇》。此书不仅是一本中国真菌分类参考资料的汇编，而且是一部中国真菌分类学巨著。戴芳

澜在书中第一次发表了 32 个真菌学名的新组合。



○ 戴芳澜在工作

戴伯伯和家父都是学农的，搞生物的。戴伯伯年长家父 9 岁，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为家父所敬重。家父在 1924~1926 年间曾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与北农大有很深的渊源。

1949 年 9 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1953 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 1959 年起，他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 1973 年 1 月 3 日去世。当时从北农大转到科学院的除戴伯伯外，还有 13 楼的刘崇乐和汤佩松等人，他们从相识、相交到相知都几十年了，而且他们都被选为中科院 1955 年第一届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在中关村时大家来往密切，尤其是家母和戴伯母、刘伯母、汤伯母联络更多，先生们则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上，而我们下一代也延续着友谊，成为世交。

戴伯伯和戴伯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唯一的孩子上山下乡了。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人员纷纷被下放，年近八旬的戴伯伯和戴伯母处理掉所有大件家具，等待离京。我们到他家时，房子里都空了，

连大床都没了，只剩下两张行军床，准备随时轻装下放。那个年代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是多么纯朴，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但他们内心深处，对时局的混乱、而不能进行学术研究深感无奈。

戴伯伯平时讲话不多，正直纯朴、实事求是，待人接物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早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许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飞扬跋扈的美籍教授顶撞，只有戴芳澜不买洋教授的账——一位当权的名叫斯图尔德的植物学教授处事不公时，他就要据理力争。在马春沅先生于1984年为戴芳澜写作的传记里，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这篇作品是经过戴伯母邓淑媛亲自审查过的。现摘录如下：

“在生物系一间西方风格陈设的办公室里，系主任史德蔚博士(Dr Steward)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走了进来。他身材匀称，举止斯文，只是唇上那一小撮浓密的黑胡，给他俊秀的容貌增添了几分威严。

“戴芳澜教授，我正等着你，请坐”，史德蔚说着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戴芳澜。

“这封信是昨天收到的，信上说哈佛大学的高等植物研究所准备出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要托我们采集所有的中国真菌标本……”他十分自信地看了戴芳澜一眼，好像必然会听到“好极了”“照办”之类的回答。然而除了窗外的知了那烦人的鼓噪之外，他却什么也没有听到。片刻的沉默之后，戴芳澜把信装进了信封，然后站起来对史特蔚说：

“我看可以。不过采来的标本要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中国，一份寄往美国。”

“为什么要留在中国一份？”

“因为这是中国的资源！”

“哦……不过中国又没有人搞这方面的工作，留一份标本有什么用呢？”

“中国有人搞!”

“谁?”

“我!”

“你?! 你过去搞过真菌分类吗?”

“过去没有不等于以后永远没有! 就从这次采集标本开始吧。”

史特蔚被这坚定自若的回答震惊了。

“坐下谈,你打算从哪里入手?”

“Erysiphales(白粉菌目)。”戴芳澜胸有成竹地回答。……

这件事说明,戴芳澜所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研究条件,是因为他凭借自己的学识素养和爱国心,敢于向外国人据理力争自己从事科研的权利。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许多教授、系主任都是美国人,其中不乏飞扬跋扈之辈。在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和科学家的准许,金大农林科生物系主任史德蔚就可以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萨克斯特(R. Thaxter)教授达成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标本的协议。戴芳澜反而是受命来承担这一任务。作为中国教授,戴芳澜当然不会甘心。因此他坚持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史德蔚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从事分类鉴定工作,便以必须要有人能够对标本进行研究作为条件相威胁,戴芳澜以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精神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自己能完成,并且很快选定了有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标本开始进行工作。在他的坚持和所显示的研究实力的事实面前,史德蔚无奈,只得同意了中美两国各执一份标本的原则。戴芳澜安排周富源、刘德林主持西南地区采集工作(焦启源也曾参加工作),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做出成绩。从此戴芳澜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他先从白粉菌做起,越做越广,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年发表了首次由中国人报道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的论文——《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1941年，他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于最后一天设中膳招待评议员，戴芳澜未去，认为不应为蒋捧场。而1942年蒋某到昆明时，也曾向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发出宴会请柬，戴芳澜收到后则将其付之一炬。他的耿直由此可见一斑。1955年12月全国科联、中国科学院和几个学会联合召开米丘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会议筹备组准备了会议的主要报告稿，请他代表报告。他急忙摇头摆手，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我听家父讲过，50年代我国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宣扬米丘林、李森科，全部否定摩尔根学派的成果和理论。不少科学家对此都有意见的。戴芳澜就以不作报告加以抵制，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一贯精神。



○ 戴芳澜夫妇于中关村14楼前

1947年，一种农业方面的学术刊物创刊，定名“农学纪录”，戴芳澜应请为它题写了刊名。同时他又写了一帖“常看到不足之处学问便有进无退”，放在办公桌的一旁，作为自己座右铭。

戴伯伯已经离开我们30余年了，他浓重的湖北话、深睿的眼神和一生不追求名利只求做好工作的作风永久地留在我的心坎中。